

邵阳文史

第 26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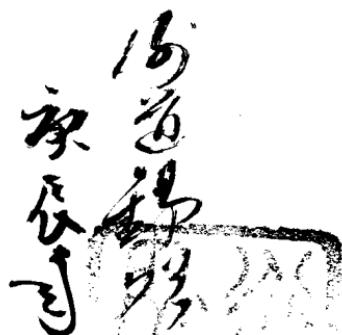


邵阳文史

第 26 辑

李永璘先生

書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主 编:王梅初
副 主 编:谢道锡 樊家信
责任编辑:刘 璞 苏缙如
责任校对:苏缙如

**邵阳文史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

邵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7.34 字数:140000

印数 1—2000

湘邵新出准字(1998)第 64 号

目 录

人物春秋

忆朱学范校长.....	蒋廷辉(1)
追念李元甲烈士.....	李仲平(5)
蔡锷力主修建南昆铁路	李国庆(10)
回忆先父菊九公	伍东白(13)
许毓翹教授逸事	鲁之洛(20)
邵阳岳氏英敏堂人.....	岳米乡、岳系伯(23)
姜瑞芝同志生平	上海音乐学院(31)
缅怀恩师张玉玲教授	易重廉(35)
两盏永不熄灭的航标灯	
——纪念萧远浚、康昭济老师逝世二周年	罗光远(44)
熊冲熊梦兄弟与南京三民中学	魏寅(50)
朱奇平生 平述略	苏缙如(56)
记画家粟千国先生	毅予(65)
不知辍耕的“牛”	
——小记者作家谭士珍	邓远才(74)
永无休止的乐章	
——音乐家尹晓星与他的创作	谢光维(78)
他为何十二次走上被告席	江源(97)

农业水利

- 邵阳市第一园艺场的创建与发展 郑昌明(106)
邵阳市水、旱灾话古今 浚渠(112)
邵阳市棉花种植兴衰史 萧新业(126)
有树就有鸟
——鸟山回忆 陈球(131)

工业生产

- 湖南第二人民机器厂的演变与发展 孙纯贵(135)

文化点滴

- 魏源图书馆概况 熊焰(142)
《严怪愚文集》序言 冯英子(146)
《严怪愚文集》序 贺绿汀(148)
“右派”养牛记 严怪愚(149)
滩头年画 傅真忻(157)
清凉寺兴衰史 马铁鹰(162)
忆合裕昌恒记墨局 朱诚(167)

城市建设

- 宝庆古城小考 刘伟顺(172)
邵阳地名琐谈 曾立勋(181)

- 回眸半个世纪隆回行政区划的变革 熊知方(183)
邵阳市火车东站选址记 李严(190)
西湖路建设始末 黄春云(195)

医卫事业

- 毕家造的一篇报导 唐伯福摘译(206)
邵阳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回顾 陈耀祖(212)

抗日烽火

- 邵阳抗日少年先锋队 龙芙蓉(225)

补白

- 成语之“最”(12页)
林则徐斩子(30页)
诸葛亮的用人标准(34页)
人才·庸才(49页)
名家学习十法(105页)
中国历史上的十个世界第一(141页)
两袖清风的来历(156页)
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国人(161页)
我国历代皇帝的寿命(180页)
书法与气功(205页)
中国宴席的最后警告(210页)

忆朱学范校长

蒋庭辉

朱学范校长，浙江嘉兴人，24岁时考入上海市邮政局任见习生。为反对外国邮政局长欺压剥削工人，组织邮政职工进行斗争，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本强占，而且日寇铁蹄长驱直入，侵犯华北。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为抗日救国奋斗，毛主席寄信给当时在上海做群众工作的朱学范、易礼容成立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团体（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朱、易积极筹办，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诞生。它一成立，就积极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工会的联合。“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劳协组织工人勇进队，为抗击日帝侵略，参加淞沪会战。上海沦陷，中国劳动协会迁往汉口，并同陕甘宁边区工会代表廖似光、刘群仙联合各地民主工会，组织工人抗敌总会，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奋起抗日。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南京很快失守，武汉沦陷已在旦夕，中国劳动协会于1938年8月再迁到重庆。

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劳协以劳工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进行工作，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在重庆大梁子中正路（今新华路）修建重庆工人福利社大楼和美工堂影剧院，创办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招募培训去印、缅等国支援盟军作战的军需运输工人，办理沦陷区技术工人内迁。我为不堪国民党通信机关大小官吏的欺压，为谋求新的职业，需要学习文化技术知识，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创办的第九、四十九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的学习。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兼任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的校长。中国劳协书记长易礼容主持劳校的工作。朱校长在劳校序言中写道：“劳工技术补习学校的创办，在我们国家里还是个创举，但在荒芜的教育园地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迎接未来国家工业化的新时代，而最主要的是提高劳工的政治水平”。劳工学生在教师们的教育和启迪下，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意识，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劳工不光要注重文化技术的研究提高，而且还需要学习对政治的认识，要熟悉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治环境。大家追求进步，积极参加“中国劳动协会”的进步组织，有的参加应募去印、缅等国支援盟军作战的军需运输工作，有的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国捐躯，有的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如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中国劳协积极领导劳工学生、劳协会员和干部，拥护国共和谈，拥护旧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中国劳动协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23条政治主张，明确要求“实现人民自由，扩大政府基础，军队国家化，废除官僚资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改善工人生活，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有权参加工厂管理，加强改善工人劳保卫生设

施等”。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为庆祝国共和谈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成功大会，中国劳动协会与国民党派来破坏大会的特务进行斗争，即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二一〇血案事件。”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陷害劳协，除下令通辑劳协领导人朱学范、易礼容外，同时强行接管中国劳协在渝一切机关，大批逮捕劳协教职员，强令陕甘宁边区工会退出中国劳动协会。劳协工人张长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教师和干部陈哲、汪进仪、王坤荣、陈杰文在重庆渣滓洞殉难。中国劳动协会已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

在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工会主席刘宁一的帮助下和指导下，劳协总部迁往香港，继续从事革命工运活动，国内工作全部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知英法各使馆要求“逮解”朱学范回国惩办，并派遣特务在香港进行暗杀，用车冲撞劳协领导人朱学范轿车，但幸免于难，只被撞伤，住进香港玛加医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派专人前往香港慰问。朱学范校长在参加世界国际工联大会后，于1948年毅然前往东北哈尔滨，与解放区工会共同发起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参加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召劳协总部迁回国，于1949年11月在北京首都召开劳协代表会议，宣布中国劳动协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组织上的统一。劳协领导人朱学范由中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邮电部部长，为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学范被“四人帮”打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关在北京秦城监狱里，“四人帮”被打倒后，担任中华全国

总工会副主席，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1年，我曾在北京探望我们敬爱的老校长、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他家住北京方成街31号，探望时朱老已身患重病未能交谈，但非常热情，由他小儿子朱培康接待，令人十分遗憾。想过去在重庆劳协和劳校，多次聆听过他不少训导和教诲，在解放后，我被选送南京华东邮电干校学习时，也听到过邮电部部长的亲谕。他对工人、干部培养学习的关心，期盼要多学本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我作为劳协的一位战士，重庆劳工技术补习学校的一名学生，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及对我们的培养与关心，曾在1995年春节，与健在的原重庆学校学生，劳协战士，现离休干部5人，以我们每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共同组诗写给朱学范老校长、劳协老领导作为新年祝词，特附于后：“新年伊始又新春，诚挚祝福颂安平，祝愿朱老身健康，万事如意福满门，昔日革命红旗举，率领邮工争人权，领导劳工求真理，渝城劳校指征程，唤起劳工团结紧，争取民主战困危，俊杰全为国昌盛，革命业绩放光辉，喜看今朝云开日，工运史上留殊勋，祝愿朱老永长寿，劳工学子奉丹心。”1996年1月7日，我们尊敬和敬爱的老领导、老校长朱学范副委员长因病逝世，噩耗从电波中传来，我们这些劳工学子万分悲痛，并分别致电吊唁和向亲属慰问，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追念李元甲烈士

李仲平

李元甲，名洞波，号啸函，班号长纬。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元1911年11月9日）生于今邵东县范家山镇祖华村李家老院子。1931年阴历四月初八（公历5月24日）为革命捐躯时，年仅21岁。

元甲是我五祖父李彦比唯一的儿子。五祖父自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化学科毕业后，曾充任财政部汉口造纸厂科员、湖南常宁水口山矿务局化验员、松柏火车站站长等职。元甲从小聪慧过人，在水口山矿务局职工子弟学校读书时，成绩特别优秀，每期总是班上第一名。1926年他高小毕业后，因当时矿区未办初中，五祖父便将他送到矿务局机械厂当艺徒。其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常宁水口山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元甲在革命风火的薰陶下，毅然投身革命，在耿飚部下担任工农赤卫队长，全力开展革命活动。在农村，他走村串户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农会，破除封建迷信，冲击剥削制度，组织平粜，维持民食，狠狠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势力。在矿区，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扩充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抵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

当时虽只十几岁，但每次在工农群众大会上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救民政策，台下总是鸦雀无声，到会人员无不洗耳恭听，连其父亲都惊叹：“洞伢子真会讲话！”由于他立场坚定，斗争果敢，表现突出，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水口山引人注目的人物，也成了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眼中钉。

声势浩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原形毕露，大动干戈，疯狂扑灭革命火焰。1927年4月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于是反共逆流席卷全国，白色恐怖弥漫各地。反动军政头目及其爪牙伸出魔掌，到处搜捕革命志士，致使工农群众运动陷入低潮，不少共产党员、工农骨干惨遭残害。

为避免反动派的搜捕迫害，1927年6月，元甲剃光头发，身穿烂衣，化装偕同乡友余克剑（又名剑三，此人后背叛革命）潜回邵阳，在家乡隐蔽两个多月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又果敢地返回水口山组织武装暴动，向敌人进行猛烈回击。此时，五祖父已调任松柏火车站站长。有一天清晨，站内一工人请假回家探亲，途中突然发现一支一百余人的队伍，有人扛步枪，有的背大刀，有的拿梭标，威风凛凛地向松柏站方向开来，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骑白马的年轻人，象是站长的儿子。这位工人便疾步返回松柏站，将情况报告五祖父。五祖父亦不明底细，为避免误伤，便叫全家大小立即疏散躲避。其时曾祖母和八叔也住在五祖父家，他们迅速躲入离站半公里的一栋茅屋里，当大队人马逼近松柏站时，从门窗缝中一眼看出，为首者正是元甲。这支队伍到达松柏站后，立即点火焚烧资本家堆放矿石的厂房，随之元甲将队伍转移到附近一山坡严密监视，直

到房屋烧毁后，未见敌人动静，于是元甲带领几个人从茅屋里找到了五祖父。他考虑到这次暴动后，必然会遭到反动军政及地主资本家更加疯狂的反扑，并很可能连累家庭，便力劝父亲跟他一起投身革命。五祖父思虑上有母亲，下有三个女儿需要照料，难以脱身，乃婉言拒绝。自此以后，元甲便转入地下斗争，长久与家人未通音信。

大约1928年七、八月间，元甲又突然从某城市只身潜回范家山老家。由于壮志未酬，屡遭挫折，感到愧对家人，因而他一见到祖母，就双膝下跪，泪如泉涌。然而，他出外两年多的情况，却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家隐蔽约三个月后，他接到党组织的密令，安排他去湘乡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有人从顾及他的安全出发，劝他放弃革命，不再外出，长期隐蔽家乡。他却矢志不移，义无反顾。在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即去湘乡，以修理汽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元甲一到修理厂，就主动积极地搞好本职工作，并特别注意搞好上下人际关系。他认厂长陈晋的母亲作亲娘，广泛交朋结友，经常与同事谈心，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受到了全厂上下的一致好评。1930年冬，在一次由湘乡至虞塘的试车中，不想途中汽车突然发生故障，车子翻倒路旁田中，车上人无一不伤，元甲头部碰破一条约一寸长的伤口。过路人纷纷围观，其中正巧有两个水口山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人，他们发现元甲后感到有点面熟，便问及伤者姓名。当时并未确认李元甲就是在水口山领导工农群众闹革命的李啸函。后来，这两个人在水口山进行了反复调查，又到湘乡查证落实，即密告于湖南省主席何健。何健命湘乡县县长田稷丰查捕。田乃于1931年3月带领大批警察包围湘乡汽车修理厂，

将元甲逮捕。此事震惊了湘乡汽车修理厂，全厂职工及陈厂长的母亲纷纷签名具保。田稷丰不仅无视民意，反而又去常宁水口山抓获曾和元甲一起闹革命的元甲二姐李如兰入狱。

在元甲姐弟双双被捕后，我祖父李子贤（排行第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五十师军需处长）、三祖父李育年（曾任常宁水口山斗岭煤矿局工程师、湖南煤矿总局工程科科员等职）等亲属，积极配合党组织极力营救，多方具禀保释。湘乡县县长田稷丰才放出元甲二姐李如兰。但声称元甲案情重大，不敢擅自作主，本县无权释放。随后将元甲送长沙，何健批转军法处处长李群审理。元甲在狱中期间，受尽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由于元甲先母已故，继母又长居外地，多年抚养并十分宠爱他的祖母不畏艰险，只身前去长沙探监，见元甲遍体鳞伤，悲痛不已。元甲却忍泪安慰祖母，并当面生吃了祖母带去的猪血丸子，以宽祖母之心。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阀何健一伙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最终判处元甲极刑。临刑前元甲设法寄回一封血书，最后两句话由衷表白：“我之死有重于泰山，请父亲及祖母勿念！”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1931年阴历四月初八，元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雨花亭。事后由族叔李周恒前往收殓，将其葬于长沙邵阳义山。随后，族间立堂兄长绥之子兴汉（名辑熙）为嗣，以续其后。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元甲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1955年先后两次派员来邵阳调查核实元甲的革命史迹并采访家属。由于元甲父母双亡，姐妹外嫁，组织上又不明其已过继嗣父，因而第一次调查未完全弄清底细。第二次去邵阳城内儒林街找到三祖父李育年后才彻底查清。来员即将元甲的“革命军人牺牲家庭纪念证”（简称烈士证）及500元抚恤金交予

李育年，并拿出登有对元甲的判决的湖南大公报给三祖父过目（当时仅年幼无知的侄孙李新民在场，另无他人）。不久，组织上又安排年过半百的李育年担任马田煤矿测管员。这些，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对革命烈属的无比关怀。

三祖父李育年收得元甲烈士证书及抚恤金后，并未告诉任何亲人，只是私身保存和享用。直到1962年2月他病逝后，才在其遗物中清出元甲烈士证书。亲人们方看到烈士证书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印及毛泽东主席的签名印监。证号为28202号。其词为：查李元甲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抚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现由其嗣子辑熙保存，我曾祖父棣庚下辖各房主要成员存有复印件，以作为追念元甲烈士的珍贵纪念品。

蔡锷曾力主修建“南昆铁路”

李国庆

1911年10月，昆明“重九起义”成功，蔡锷出任云南都督。他上任以后，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当时闭塞落后的云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云南山高水险，关山阻隔，是影响各方面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于1913年1月致函孙中山先生（当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指出：“窃维云南，当英法二国之冲，为西南各省之障，自法人滇越路成，滇之危机日迫，稍（稍）有知识者，每闻越轨汽笛之声，辄心忧如捣，固忧滇也。然西南之安危系于滇，全国之安危亦即系于滇也，岂仅忧滇而已哉。现今滇省因款奇绌，尚无已成之铁路，其待办者，曰滇蜀，曰滇缅，曰滇邕，曰滇黔，四者之中，权其轻重，又以滇缅、滇邕为最要（注：引号为笔者所加，以下同）。然缅、邕两路（如果）同时并举，财力实有不济。于兹二者，又择其缓急，则以滇邕为急切。盖铁路政策，本取商业上、军事上之又便利也。缅邕两路虽于国防、商务均有关系，而缅路所以通外，邕路所以通内。滇省远距中原，非先通内以联络腹地各省，实不足以图存，况滇邕路线于商业上、军

事上均占优胜，此所以为急之又急者也。且此路线短，费省，成功较易，而收效颇速。”在这封信中，蔡锷还设想了滇邕铁路的起止路线，“其线西起昆明，由曲靖经黔之兴义，过桂之百色，以直达南宁（与今南昆铁路大致相同，笔者注），若再由南宁延长至龙门岛①尤为美善。”蔡锷认为，“此地可辟为商港，并可营为军港，以屯海军，此路关系甚属重要。”关于修建滇邕铁路的筹款事宜，蔡锷也有考虑。他在信中力陈己见，拳拳之心可鉴：“一切情势久为先生洞鉴，无待赘述，但滇以贫瘠之省分，而谋此浩大之工程，筹款维艰，不能不望中央主持。上年曾详陈此路情形，电请大总统饬部核议，由桂、粤、滇、黔四省分段承办，嗣又恐各省难于担任，反致延搁，电请交通部仍归国有为宜，而部以限于财力，不允所请。后接胡都督鱼电，欲联络粤、桂、蜀、滇、黔五省自行筹款兴办，公推先生主持其事，先在粤设筹办机关，当即电恳先生毅力担任，并请电商粤、桂、川、黔四省妥筹办法。此路之望助于先生，若大旱之望云霓也。今先生以当代之伟人，操全国之路政，富国强兵，安内攘外，皆将于此决政策焉，必能使西南边徼，转危为安。务祈鼎力维持，筹拔巨款，俾滇邕轨道早日兴筑，早日告成。行见懋迁，货物工商，皆可振兴；征调将兵，滇粤互相策应，破外人之阴谋，保西南之大局。不惟云南之幸，实全国之幸也。”

1913年9月，蔡锷奉调赴京任职，仍念念不忘修筑滇邕铁路大计。临行前，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表示：云南最重要的还是交通问题。在国防上尤应与广西交为一气，如有缓急，才能应援。我到京，当向中央建议，趁速修成滇邕铁路，以为西南国防初步基础。

在蔡锷将军逝世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的这个美好的设想